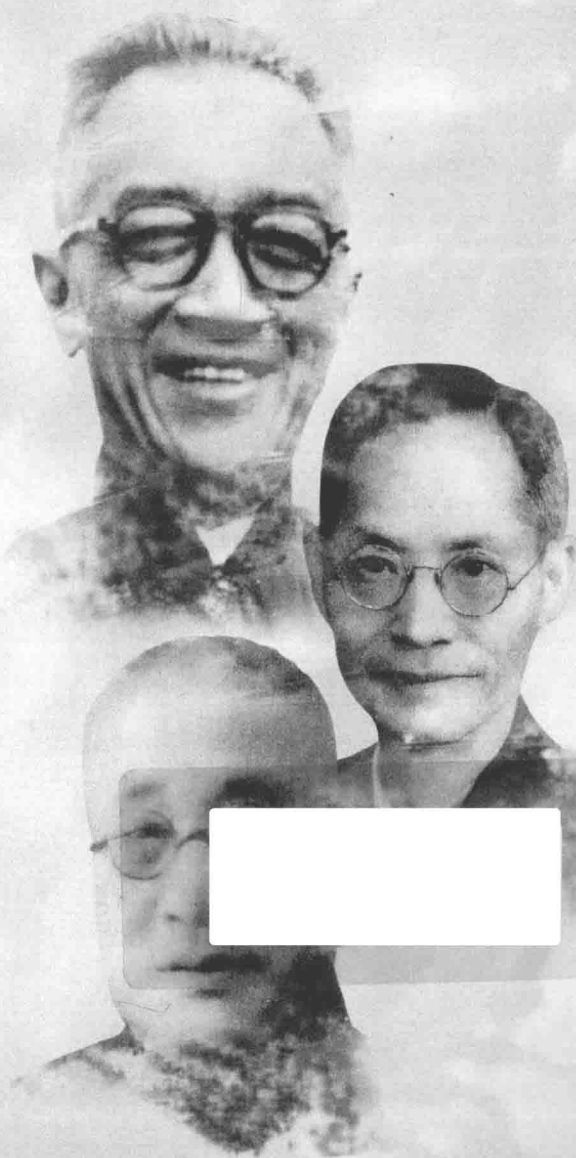


中國近代教育的奠基者

—— 八位大學校長

蔣夢麟、胡適、張伯苓、梅貽琦、
竺可楨、任鴻雋、羅家倫、胡先驕。

智效民◎著



認識大陸作家系列

中國近代教育的奠基者

——
八位大學校長

蔣夢麟、胡適、張伯苓、梅貽琦、
竺可楨、任鴻雋、羅家倫、胡先驕。

智效民◎著

認識大陸作家系列

中國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八位大學校長 / 智效民著。

-- 一版.--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2009.11

面；公分.-- (史地傳記類；PC0098)

BOD 版

ISBN 978-986-221-328-5(平裝)

1. 校長 2. 傳記 3. 教育行政 4. 中國

526.42

98019999



史地傳記類 PC0098

中國近代教育的奠基者 ——八位大學校長

作 者 / 智效民

主 編 / 蔡登山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黃姣潔

圖文排版 / 鄭鉅旻

封面設計 / 陳佩蓉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09 年 11 月 BOD 一版

定價：320 元

• 請尊重著作權 •

Copyright©2009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前言

智效民

近年來，我在研究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時候，接觸到許多大學校長的材料。比如北京大學的蔡元培、蔣夢麟、胡適，清華大學的羅家倫、梅貽琦，南開大學的張伯苓，浙江大學的竺可楨，四川大學的任鴻雋，中正大學的胡先驕，都為中國現代教育事業打下很好的基礎，他們的思想理念、行為方式、人格風範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只可惜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們非但沒有繼承，反而在全面否定後將它們全部拋棄。這就使現代學術教育傳統被人為地中斷了。學統的中斷，讓我們迷失方向，走了很大彎路。因此我覺得有義務儘快梳理一下他們的人生經歷、教育思想和人格風範，為新世紀的教育改革提供某種借鑒。

在我看來，這些老校長做人做事雖然各有千秋，但他們卻有許多共同的特點。我把這些特點概括為「懂教育，負責任、重人才，沒私心，有魄力」等幾個方面。這話看似老生常談，但如果與具體事例結合起來，也能成為一面鏡子，讓我們看出問題，找到差距。

（一）「懂教育」的含義是：

一要有正確的教育理念，二要摒棄官本位意識

一談到「懂教育」，人們往往在管理層面考慮較多，而對管理者的定位以及學校的職責關注不夠。其實，懂教育的含義一是要有正確的教育觀念，二是要明確的自我定位。

近年來，人文教育的缺失和應試教育的危害引起廣泛關注。但是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人們並不注意人文教育的核心內容是什麼，其結果還是不能理解教育的真諦。

所謂人文教育，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提出的一種全新的教育理念，其核心是反對神權，提倡人權。人文主義者認為人是萬物之靈，每個人都有通過獨立思考來認識這個世界、享受美好生活的權利，而教育本身就是啟發人們獨立思考，讓人們認識世界、享受生活的一個過程，因此人文主義教育是對個人能力和生命價值的最大肯定。

這種理念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文藝作品中有深刻表現。比如拉伯雷在《巨人傳》中就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國王的兒子卡岡都亞起初接受的是經院教育，那些空洞的知識和死記硬背的方法使他越學越傻。後來國王請來人文主義學者，教他學習文學、數學、幾何、天文、地理、醫學等知識，並注重體育、旅行、探險、參觀和各種遊戲，才使他聰明起來。為此，卡岡都亞讓自己的兒子也接受人文主義教育，結果是一代比一代更聰明。

從這個角度來看，當今教育的主要問題不僅是經費短缺，更重要的是手段落後，觀念陳舊。多少年來，在尊重知識、尊

重人才的旗號下，人們把教育視為培養人才的一種手段，把上大學當作改變命運最好途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教育在飽受經費不足之苦的同時，成了全社會最關心的問題和學生、老師、家長們最大的負擔。於是，「知識改變命運」的口號便成了「書中自有黃金屋……」的翻版，一年一度的高考也成了科舉制度的再現。

出現這種尷尬的局面，與現代教育的模式有關。自從工業革命以來，人們被大工業生產的威力所震撼，也想把學校辦成工廠，教室辦成車間，讓校長成為廠長，教師成為工人。在這種情況下，學生便只能是任其加工的原料或零件了。他們本身所具有的天賦與無限的可能性，便淹沒在這種「大工業生產」的流程中。這種新的教育模式在清朝末年傳到中國以後，曾經起過積極作用，並形成廢科舉、辦學校的社會潮流。與此同時，實用主義教育觀念也承襲洋務運動的衣鉢，在較長時期甚囂塵上。好在當年還有蔡元培、胡適、梅貽琦等一大批教育家看到了其中的危害，再加上辦學自由、教育獨立等制度保障，才沒有出現較大的弊病。只是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全面學習蘇聯以來，教育領域的「批量性人才生產」才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學校是一個單純傳授知識的地方嗎？學生是任人加工的原料或零件嗎？學習是為了將來的工作做準備嗎？有用人才能夠大批量生產並通過考試來檢測是否合格嗎？讓我們看看先哲的觀點和做法，就可以發現這種想法是多麼荒唐。蘇格拉底說，真正的知識存在於人的內部，教師的作用是喚醒潛藏於學生內心的知識，使之達到意識的層面。因此，他認為教師應該利用提問和對話的方

式來啟動學生的潛意識，而不是傳授所謂的知識或智慧。杜威也認為，人的知識和經驗是自身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如果教育不能適應受教育者內心的需要，而是成為一種外來的壓力，就會扼殺人的天性。基於這一理念，他在提出「教育是生活的過程，而不是未來生活的準備」的同時，還指出現代教育的失敗，往往是因為人們「把學校當作一個傳授某些知識，學習某些課業，或養成某些習慣的場所」，其結果不僅扭曲了教育，也使人們為了虛幻的將來失去現在。這種思想在中國古代教育中也有深刻體現。孔子所謂教學相長，明清時代私塾和書院中先生對學生的人格薰陶，就是最生動的體現。可惜隨著社會的變革，這些傳統早已丟失，才使我們的教育變成今天這種模樣。

由於人們把大學誤認為是單純學習知識的地方，因此許多人上大學選專業，往往是為了將來找個好工作，這反映了我們對教育的錯誤理解。如今大學的專業設置過多過細，就是違背大學宗旨和教育規律的具體體現。另外，我們的教材越來越深，科目越來越多，課時越來越長，作業越來越重。學校總想用考試來整治學生，甚至把考試當作賺錢發財的手段。有人說現在的學校成了嚴酷的訓練營，可怕的煉丹爐，是有根據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大學校長如果沒有正確的教育理念，不明白教育的真諦，即便是具有很強的管理才能，也不可能把學校引上正路。

懂教育的第二個含義是指大學校長一定要摒棄官本位意識，給自己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由於現行體制和文化傳統等原因，中國的官本位意識非常嚴重。許多人以為大學校長也是官，這是非常錯誤的。

最近大家對胡適與魯迅的比較非常關注，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說魯迅沒當過什麼官，但胡適卻當過駐美大使和北大校長。還有一篇文章說，胡適多次出國是拿著公款旅遊。這些話說明了作者的無知。他們不知道：第一，大學不是一個行政機關，因此大學校長不是官；第二，當年文化教育經費的管理與現在不一樣，不是校長的「一枝筆」說了算，因此胡適不可能想花多少就花多少。

既然大學不是行政機關，那麼它是個什麼地方呢？對於這個問題，蔡元培有很好的解釋。他說：大學不是販賣畢業證和灌輸固定知識的場所，而是一個研究學理的地方。這地方採取的是「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態度，奉行的是相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原則。因此，校長不是一個行政長官，而是一個學術研究的組織者、領導者。他既沒有服從上級的義務，也沒有裁定學術思想的權力。他的最大職責就在於提倡思想自由，維護學術尊嚴，爭取教育獨立。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蔡元培因為不能履行這些職責，只好憤然辭職。他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中說，他每天被一大堆無聊的公文和事務所包圍，還要迎來送往，與教育部那些一知半解的官員周旋，因此他感到痛苦不堪。另外，他認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因此在他主持北大校務的時候，為了「稍稍開點風氣，請了幾個比較有點新思想的人，提倡點新的學理，發佈點新的印刷品，」但當局卻把這種做法視為洪水猛獸進行干涉。因此他聲明「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了（《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98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這與最近陳丹青辭去清華大學特聘教授的原因基本一致。我舉這個事例，並不是主張凡遇類似事情就採取蔡元培的做法，而是說真正的大學校長應該有這種理念。陳丹青辭

職的消息傳出後，網上有篇文章，意思是說陳丹青不玩了，但我們還要玩下去。不過，我們繼續玩的目的不是遷就錯誤，而是為了解決問題。陳丹青接受記者採訪時也很欣賞這個觀點。因此我認為懂教育的第一個含義是絕不要把校長當成一個官。只有這樣的校長，才能把學校辦好。

（二）「負責任」的含義是：

一要培養學生的研究興趣，二要防止把他們變成不會思考的機器，三要鼓勵他們實行自治

因為校長不是官，他就不需要對上級負責，而是只要對學生負責就行。但是如何負責任，負什麼責任，也大有講究。

所謂對學生負責，首先是要培養他們研究學問的興趣。許多人以為研究學問是學者的事，其他人不必介意，這是錯誤的。1929年7月，中國公學十八級學生畢業，擔任校長的胡適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了下面一番話。

諸位畢業同學：你們現在要離開母校了，我沒有什麼禮物送給你們，只好送你們一句話罷。

這一句話是：「不要拋棄學問。」以前的功課也許有一大部分是為了這張畢業文憑，不得已而做的，從今以後，你們可以依自己的心願去自由研究了。趁現在年富力強的時候，努力做一種專門學問。少年是一去不復返的，等到精力衰時，要做學問也來不及了。即為吃飯計，學問決不會辜負人的。

吃飯而不求學問，三年五年之後，你們都要被後進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時候再想做點學問來補救，恐怕已太晚了。

接下來，胡適針對許多人所謂沒有時間、不具備條件等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這其實都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是你對自己負不負責任。他告誡自己的學生：「學問便是鑄器的工具，拋棄了學問便是毀了你們自己。」（《胡適全集》第3卷，第825-826頁）

這裏涉及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上大學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是為了解決「飯碗」問題，還是為了讓生命更有意義？許多人把上大學當作「搶飯碗」（蔡元培語）的敲門磚，一旦文憑到手，就以為不需要做學問了。他們不知道，即使是為了吃飯，學問也具有長久的競爭力。因此，在目前的社會機制不可能為年輕人提供足夠就業機會的情況下，不要拋棄學問，乃是每一個人的最好選擇。何況，人生的目的絕不僅僅是為了找到一碗飯吃。胡適說，生命的意義是每個人賦予它的。「人生固然如夢，但一生只有這一場做夢的機會」。因此，要想讓「努力做一個轟轟烈烈像個樣子的夢」，而不是「糊糊塗塗懵懵懂懂混過這幾十年」光陰（《胡適全集》第3卷，第818頁），唯一的選擇就是不要拋棄學問。

此外，對學生負責還有一個把他們培養成什麼人問題。前面說過，由於學校像工廠，就很容易讓學生成為千人一面的零件或機器。為了避免現代教育制度的這種缺陷，當年的老校長都大力提倡通才教育。他們認為，通才教育與專才教育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前者是為了培養人，後者是想把人變成機器。

關於這個問題，愛因斯坦的話非常精闢。他說：「（僅僅）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要使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並且產生熱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須獲得對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鮮明的辨別力。否則，他連同他的專業知識就更像一隻受過很好訓練的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展的人。」（《愛因斯坦文集》第3卷310頁，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他還說：「……另一方面，我也要反對認為學校必須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後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這種觀點。生活所要求的東西太多種多樣了，不大可能允許學校採取這樣的專門訓練。除開這一點，我還認為應當反對把個人當作死的工具來對待。學校的目標始終應當是：青年人在離開學校時，是作為一個和諧的人，而不是作為一個專家。照我的見解，在某種意義上，即使對技術學校來說，這也是正確的，儘管技術學校的學生將要從事的是一種完全確定的專門職業。發展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一般能力，應當始終放在首位，而不應當把獲得專業知識放在首位。如果一個人掌握了他的學科的基礎理論，並且學會了獨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會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種主要以獲得細節知識為其培訓內容的人來，他一定會更好地適應進步和變化。」（同上，146-147頁）對照這兩段話，就可以發現我們的教育為什麼會失敗。

此可見，不要讓學生為了當專家而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不要讓他們淪為「一隻受過訓練的狗」，而要讓他們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就是對學生負責。在這方面，學電機出身的梅貽琦和氣象學家竺可楨看得最清楚，努力得最有效。

梅貽琦 1931 年擔任清華大學校長的，他一上任就告誡學生：「有人認為學文學者，就不必注意理科；習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見似乎窄小一點。學問範圍務廣，不宜過狹，這樣才可以使吾們對於所謂人生觀，得到一種平衡不偏的觀念。對於世界大勢文化變遷，亦有一種相當瞭解。如此不但使吾們的生活上增加興趣，就是在服務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這是本校對於全部課程的一種主張。盼望大家特別注意的。」（《梅貽琦教育論著選》，第 17 頁，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後來他一再強調，大學教育的目的，「確乎不在養成一批一批限於一種專門學術的專家或高等匠人」，而在於「培植通才」。因此，即使是工業方面的人才，「對於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以至於一切的人文科學、文化背景，都應該有充分的瞭解」；相比之下，「嚴格的自然科學的認識倒是比較次要」的了（同上，第 184-185 頁）。

竺可楨認為：「現在大學教育，注重各種專門知識之傳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這不僅不利於科學精神的形成，而且還會導致「社會道德與政治風氣之敗壞」。（《竺可楨全集》第二卷，第四五三頁，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有鑒於此，他一方面倡導人文知識和科學知識並重的通才教育，一方面主張在大學應該推行導師制。竺可楨是 1936 年擔任浙江大學校長的。4 月下旬，他到學校視察並在體育館發表演講時說：「教授是大學的靈魂，一個大學學風的優劣，全視教授人選為轉移。假使大學裏有許多教授，以研究學問為畢生事業，以教育後進為無上職責，自然會養成良好的學風。」。他還說：「大學所施的教育，本來不是供給傳授現成的智識，而重在開闢基本的途徑，提示著智識的方法，並且培養

學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學者有自動求智和不斷研究的能力。」（同上，第 334-337 頁）5 月 18 日，他在宣誓典禮結束後致答詞時指出：「學校不是一個工廠，……大學目的，不在乎使大學生能賺得麵包，而在乎使他吃起麵包來滋味能夠特別好」。（同上，第 351 頁），因此，大學教育不應該把人變成賺錢的機器，而應該讓學生懂得怎樣做人，怎樣生活。他告誡自己的學生，千萬不要有做大官賺大錢的想法，否則就有變成貪官污吏的可能。9 月 18 日是國恥紀念日，他在新生座談會上說：大學生是人生最快活的時期，沒有經濟負擔，也沒有謀生的問題，因此大家除了誠實做人、勤懇求學之外，最要緊的是要有一個清醒的頭腦，這比單純掌握一門實用技術更重要。「專精一門技術的人，頭腦未必清楚，反之，頭腦清楚，做學問辦事業統行。我們國家到這步田地，完全靠頭腦清醒的人才救。」（同上，第 371-372 頁）

竺可楨是哈佛大學畢業生，1936 年哈佛大學建校三百周年時，他還介紹了該校校長康諾德的辦學方針：「第一，主張學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謂 Academic Freedom。反對政黨和教會的干涉學校行政與教授個人的主張；第二，學校所研究的課目，不能全注重於實用，理論科學應給予以充分發展之機會。」（同上，第 370 頁）哈佛大學之所以成為世界一流，顯然與它的辦學方針有關。這對我們那些想要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校長們是個很好的啟示。

值得注意的是，梅貽琦和竺可楨都主張大學一年級不分專業，都認為只重視專業知識而不重視人格操守的人，對社會的危害要比沒有知識的人更大。因此如何正確地引導學生，並想辦法改變那些不正常的狀況，才是對學生負責。

除了激發研究興趣，提倡通才教育之外，培養學生的自治能力也很重要。前幾年楊東平編了一本名為《大學精神》的書，其中陶行知、蔣夢麟、林礪儒的四篇文章涉及到這個問題。陶行知創辦了曉莊師院，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五四運動時，他寫了一篇〈學生自治問題之研究〉的文章，其中說：所謂學生自治，是對幾千年來保育主義教育的反動，它「不是自由行動，乃是共同治理；不是打消規則，乃是大家立法守法；不是放任，不是和學校宣佈獨立，乃是練習自治的道理」（《大學精神》第261頁，遼海出版社2000年版）。他認為：共和政體與專制政體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前者由自治的公民組成，後者由被治的順民組成。順民被治，尚可苟安；公民自治，則可太平。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已經有不甘被治的要求，又沒有實行自治的能力，那將是最可怕的一種局面。因此，公民自治是共和國的立國之本，在學校中培養學生的自治能力，是達到長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反之，如果我們的大學裏不能用自治的方法培養公民，而是用管制的方法造就順民，那麼我們的共和國就有名不符實的可能。在這篇文章中，陶先生還就學生自治的利弊、範圍，以及它與學校的關係等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在學校中實行學生自治不是為了爭權奪利，不是為了駕馭別人，更不是要與校方分庭抗禮。學生自治的目的，一是為了培養獨立的人格，以改變專制時代大事小事都要由師長包辦的習慣；二是為了讓學生關心公眾幸福、承擔共同事務、明辯公共是非。他強調，凡是願意做共和國公民的學生，只要大家不願爭權，而願服務，不願凌人，而願治己，不願對抗，而願協助，不願負氣，而願說理，就能把學生自治搞好。

蔣夢麟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當過北京大學校長。他說：「我覺得北大這麼大的一個學校，研究學問、注重品行的件件都有，就是缺少團體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一方各謀個人的發達，一方也須兼謀團體的發達。」（同上，第 275 頁）他強調：「學生自治，並不是一種時髦的運動，並不是反對教員的運動，是『移風易俗』的運動，是養成活潑潑地一個精神的運動。」（同上，第 271 頁）

林礪儒早年在多所大學任教，上世紀五十年代曾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教育部副部長。他指出：「學生自治是學校裏必不可少底訓練。……我們中國人向來沒有自治底習慣，也可以說中國人舊習慣和團體自治正相反對。因此，學生自治在中國學校裏，更該負起改造國民性底重大使命。」（同上，第 278 頁）這說明，學生自治既是老一代教育家的共識，也是大學生進入社會的必要準備。然而時至今日，國人對此還沒有清醒的認識。舉一個眾所周知的事例：許多大學為了維護秩序，雇傭大量保安人員，這其實是對學生能力的最大蔑視。在這種情況下，當代大學生怎能做到自理、自律、自強、自信呢？

寫到這裏，又想起近年來關於大學生道德滑坡的議論。值得玩味的是，儘管有關部門一再強調德育課如何重要，但該課程卻始終處於「教師不好教，學生不愛學」的尷尬境地。我認為，如果我們的校長、老師和有關方面的負責人能夠仔細研究一下學生自治的真諦，弄明白「智育注重自學，體育注重自強，德育注重自治」（陶行知語）的道理，這個問題是很好解決的。

(三)「重人才」的含義是：

不僅要禮賢下士，更要無為而治

所謂尊重人才，首先表現在求賢若渴、不拘一格降人才方面。在這方面，老校長們堪稱後人的表率。

蔡元培主持北大時，為了提倡新思想，曾聘請胡適、梁漱溟來北大任教。當時二人都很年輕，才二十多歲，胡適還有個洋文憑，梁漱溟根本沒有學歷，後來錢穆去燕京大學任教也沒有學歷。相比之下，如今的大學門檻越來越高，非博士進不去，進去也呆不住，逼得許多四、五十歲的大學教師為了那張博士文憑，不得不去充當現代教育制度的老童生。這是教育資源和人才資源的極大浪費。另外，如今大學對教師的聘任考核制度既繁瑣又死板，大家對無窮無盡的考核和表格早已怨聲載道。這種狀況的形成固然與管理上的教條主義和文牘主義有關，但也隱含著對教師的不尊重和不信任。面對這種情況，陳丹青不能忍受，說這是一格一格降人才，可謂一語中的。

在求賢若渴方面，竺可楨值得稱道。他擔任校長後，聽說馬一浮和邵裴之的學問很大，被「杭州視為瑰寶」，便多次登門拜訪，請他們前來任教。誰知馬一浮堅持學生必須登門請業，不能上門送教，才只好作罷。抗日戰爭開始後，馬一浮帶著許多書逃難，竺可楨幫助他渡過難關，他才答應到浙大授課。

除了求賢若渴、禮賢下士之外，堅持教授治校的辦學理念更是尊重人才的具體表現。竺可楨上任前，發現工學院院長朱一成不僅反對教授治校，而且還只拿著薪水不到學校，便覺得此人不堪重

用。因為教授治校是竺可楨的一貫主張，他認為要想把大學辦好，要「首先覓得一群志同道合之教授也。」（《竺可楨日記》第1冊，第26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可見對人才的尊重，不僅是指物質上的滿足、交往中的禮貌，還包括人格上的信任、工作上的支持、管理上的合作。

蔡元培也是教授治校的倡導者。當初他擔任北大校長後，發現一切校務由校長和學監主任、庶務主任商量決定，連學長（相當於學院院長）也不參與。他認為這種辦法不妥，便組織評議會、教授會和各種委員會，分別管理行政、教務等事宜。這樣一來，既體現了對人才的尊重，也為北大奠定了民主管理的制度基礎，蔡元培說，有了這種制度，「就是一年換幾個校長，對於諸君研究學問的目的，是決無妨礙的。」（《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42頁）

在這方面，梅貽琦則是另外一番氣象。他的最大特點是不愛說話，因此被人稱為「寡言君子」。按照清華大學的規定，凡是學校規章制度、年度預算、新增專案、建築設計……，都要由教授會和評議會討論決定，而教授會、評議會都要由校長主持。許多人在回憶中談到，每逢開會梅貽琦很少說話，而是仔細聽取別人意見。作為一校之長，他為什麼會如此呢？這是因為他對自己扮演的角色非常清楚。他說他在學校就像京劇中的「王帽」一樣，看似重要，卻不大開口，主戲要讓別人來唱。正因為這樣，他在處理校務時總是非常尊重大家的意見，有一種「吾從眾」的大氣。當年數學教授熊慶來要破格錄取華羅庚，他完全支持。朱自清在一篇文章中說：「清華的民主制度，……究竟還是很脆弱的，若是